

Publicity Bureau) 在1935年出版了他們的第一本單獨的加拿大華人電話簿。

《白頁書》，如同其引用和被建立的技術一樣，通過當前條件來連接過去的環境。如今，隨著我們繼續將公共「信息」轉換為公共「數據」的貨幣，這些紙質目錄的減少標誌著人與人之間聯繫關係的變化。使用數字材料是即時，直接和高效的。另一方面，電話簿提供了另一種視角——記錄了從前那些孕育了當今環境的複雜和深刻的決策。

作者簡介 /

Kevin Day的實踐和研究以聲音，視頻，文字，圖形和媒體裝置的形式，考察與數字媒體相關的辯論，例如算法文化，數字認識論，大數據，中介，非物質勞動和信息資本主義。在技術哲學，媒體研究和批判理論的指導下，他的研究表達了一種對通過信息構架世界的普遍邏輯提出質疑的緊迫性。Day出生於台灣台北。他獲得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目前居住在溫哥華。他的研究得到了加拿大藝術署和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理事會（SSHRC）的資助。

藝術家簡介 /

Milton Lim (他/他的) 是一位基於溫哥華的媒體藝術家和表演創作者。他基於研究的實踐利用公開可用的數據和交互式媒體來闡明在權力和政治的抽象框架內的價值，論述和勞動的表達。Milton擁有西蒙·弗雷澤大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的戲劇表演和心理學學士學位。

他的項目曾在PuSh國際表演藝術節 (溫哥華)，溫哥華美術館，VIVO媒體藝術中心，CanAsian舞蹈節 (多倫多)，Carrefour國際劇院節 (魁北克市)，西雅圖國際舞蹈節，Risk/Reward節 (波特蘭)，artsdepot (倫敦)，soft/WALL/studs (新加坡) 和澳大利亞的達爾文音樂節等呈現。

Milton是Hong Kong Exile藝團的聯合藝術總監，Theatre Conspiracy的藝術助理，videocan的檔案員，The Cultch的數字互動設計師，以及culturecapital (表演藝術經濟交易紙牌遊戲) 的聯合創造者之一。他目前是Theatre Centre (多倫多) 的駐場藝術家。

Milton Lim的個展《白頁書》目前在新畫廊的主空間 (208 Centre St SE) 展至2020年12月19日。

白頁書 / Milton Lim

展覽介紹 /

「電話已經被認為是推動工業快速發展的原因……美國商務部在1907年列出了依賴『跨空間即時通信』的領域：『農業，採礦，製造業，運輸；實際上，自然和人造資源的生產和分配的各個分支』……換句話說，經濟運轉中的每一個齒輪。」(Gleick, 2011年, 191至192頁)。

在以上這段簡短的文字中，歷史學家詹姆斯·格里克 (James Gleick) 講述了電話技術不僅在電信業歷史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還在二十世紀初社會經濟格局的所有其他方面也起著關鍵作用。在北美工業空前增長的背景下，移民構成了這一局面的另一部分——工業增長中不可或缺但經常被邊緣化的一部分。考慮到當時在溫哥華的華裔人口中有一大部分是從事鐵路行業的，我們也許可以提出電話的普及和移民與工業化之間有著聯繫；我們可以通過電話簿的記錄來理解這一聯繫。巧合的是，在1907年，排亞聯盟 (Asiatic Exclusion League) 組織了一場遊行，在溫哥華的唐人街和日本城引發了為期三天的騷亂。種族，移民，電信，工業化和人口分類之間的微妙關係和社會政治糾纏都呈現在Milton Lim的互動媒體裝置作品《白頁書》中。這件作品由參與者與在其中展示的電話簿的互動激活。

「電話簿很快成為當今最全面的人口清單和目錄」(Gleick, 2011年, 第194頁)。從這個角度來看，電話簿可以說是當今無處不在的算法監視和不斷擴展的人類 (以及非人類) 數據庫的先驅。傳統的知識分類系統與商業搜索引擎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這種聯繫著重強調了分類系統 (或看似無害的人員列表)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現有的權力結構決定的 (Noble, 2018年)。可以說，電話簿及主導其分類的系統沒有什麼不同。它們其中都嵌入了由主要政治力量設計和部署的信息創建，傳播和檢索的政治化過程。

為了調查1900年代溫哥華的社會政治格局以及卑詩省華裔加拿大人的地位，Lim研究了該時代的電話簿。他認為，每本電話簿在特定的時間點上記錄著各自覆蓋區域的華裔加拿大人口。這些電話簿讓Lim對當時人口的規模和多年來的人口數字變化有所了解。而最重要的是，這些電話簿是一種了解這些人口生死狀況記錄的渠道。經過調查，也許毫不意外地，在1900年代早期，卑詩省/溫哥華的電話簿將華裔居民和企業與目錄隔開。比如說，在1900年的卑詩電話簿中，「智利領事館」和「奇普曼」(姓氏) 之間寫著：「華人目錄，見『溫哥華』的末尾。」華裔加拿大人被隔開。根據記錄，這種隔離始於1882年 (列出了45個條目，並且是在1885年開始徵收華人人頭稅之前的3年)，首先是維多利亞目錄，然後是溫哥華目錄，一直持續到1923年 (《排華法案》出台的年份)，直到亨德森的大溫哥華目錄 (Henderson's Greater Vancouver Directory)。電話簿可以說是當時的搜索引擎，與當今的搜索引擎非常相似，由製定，啟用和維持特定社會關係的決策主導。

除了卑詩省的目錄外，還存在著一本與傳統電話簿分開的華裔加拿大電

話簿。《溫哥華中文電話簿》(Vancouver Chinese Telephone Directory) 和《Chinatown News》自1935年以來一直在出版。在卑詩省目錄中對華裔居民和企業的不一致的包含和系統性的隔離的背景下，《中文電話簿》更加體現了信息，政策，以及社區建設之間的複雜關係。

技術文物 (Technological artifact) 體現了其在其中發展和運營的社會，文化，物質和經濟條件，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 (Winner, 1980年)。在《白頁書》中，交互式數字媒體的組合使參與者和電話簿界面之間可以互動。電話簿是某個歷史時期的人類生活的記錄和目錄。通過參與者與十二個「觸摸板」的互動，電話簿的索引特性以這種方式被激活，從而產生多種不同的聲音和投影狀態。然後，電話簿以不同的形式被重新構造，既可以是作為常規數據，又可以是作為地理，時間，政策，統計數據以及曾存在的人類生活，等等。這體現了電話簿在更大的政治領域中的地位。電話簿與電信領域之外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經濟因素交織在一起，成為了Lim考察並邀請參觀者研究二十世紀初在溫哥華開始至今的華裔僑民歷史的紐帶。

參考資料 /

Gleick, J. (2011年), 《信息：歷史，理論，洪水》，紐約：萬神殿出版社。

Noble, S. U. (2018年), 《壓迫算法》，紐約：紐約大學出版社。

Winner, L. (1980年), 「非自然存在物體包含政治嗎？」, 《Daedalus》, 第109輯, 121至136頁。

——文 / Kevin Day

展覽簡介 /

《白頁書》是一件以物件為導向的多媒體裝置作品，將電話簿作為人類遷徙的實時檔案進行演示。《白頁書》由投影的數據集，生成的聲音，十二個電話簿 (佈置成電話鍵盤的形式) 和攝像頭傳感器組成，創建了一個可用來考慮名稱，電話號碼和地址隨時間形成的擴展關係的空間。

通過使用常見華人姓氏來創建抽樣框，電話簿成為了捕捉當代對溫哥華住房市場危機和列治文種族化語言政策形成之前的條件的時間膠囊。它追溯了上個世紀華人移民到加拿大的浪潮：金礦，新的就業機會，許多重大的海外政治轉變以及最近已經廢止的移民投資者計劃 (IIP) 促成的旅程。該移民投資者計劃從1986年至2014年迅速改變了卑詩省的種族人口統計。

電話簿目錄保存了有關誰允許擁有土地，誰被政府承認為公民，以及飛地在何處發展的信息。它們甚至記錄了在1900年代初卑詩省電話簿中排除中文名稱的情況，這反過來導致了溫哥華的中文宣傳局 (Chinese